

跨越发展的 陷阱

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
的
突破性改革方案

●
周天勇

——
著
●



经济增速下行 风险重重！

如何实现增长 跨越陷阱？

解析风险之原因 研判扭转之优势 提出增长之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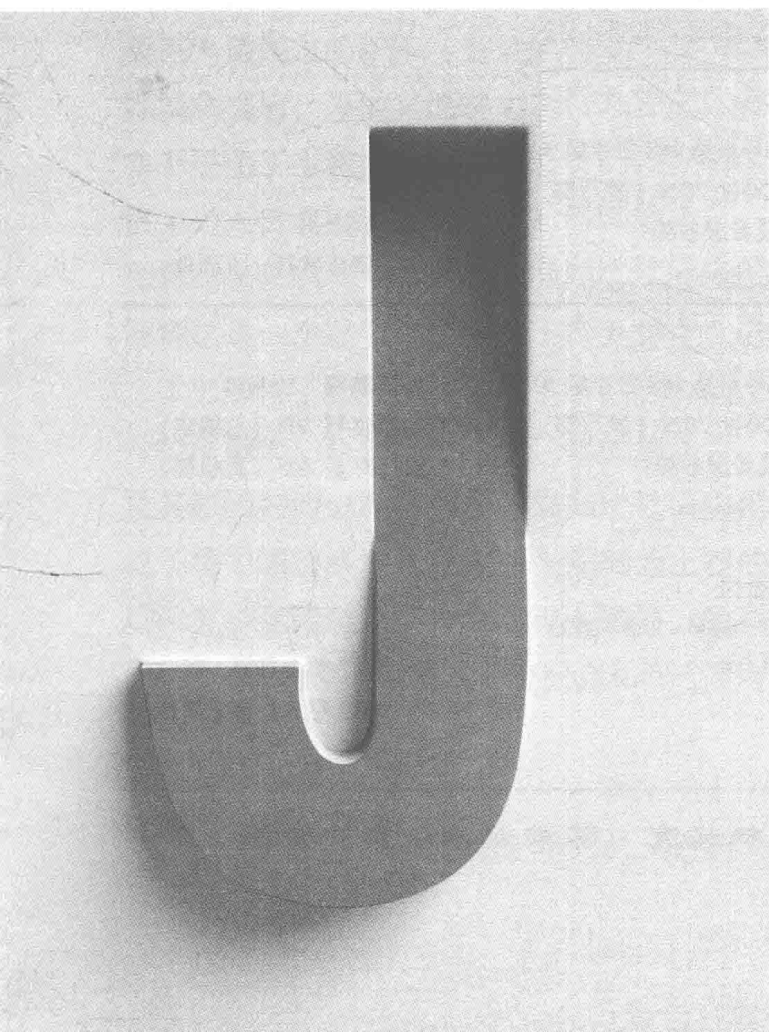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跨越发展的陷阱

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
的
突破性改革方案

●
周天勇

著
●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突破性改革方案 / 周天勇
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 3

ISBN 978 - 7 - 5047 - 6436 - 2

I. ①跨… II. ①周…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6169 号

策划编辑 赵 翠

责任编辑 李彩琴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丽丽 张营营

责任发行 王新业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436 - 2/F · 2723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推荐序

问题导向对策研究的精心之作

周天勇同志是一名有着深厚经济学功底和很务实的经济学家。看完天勇同志的新作《繁荣的轮回》和《跨越发展的陷阱》两本姊妹篇原稿后，为他直面现实、大胆探索的理论勇气深深打动。第一本书描述了生育控制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导致少子化、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萎缩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迷，其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和总需求收缩与一个滞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影响关系，解释这是一次迄今国民经济下行九年之久基础性的深层次原因；第二本书探讨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另外两个原因即企业高成本和对外经济漏损，在分析中国存在的优势条件，以及在对经济增速变化及其原因的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系统地构思了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的一个框架性的方案。这项研究对我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括本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以下几点值得称赞。

一是敢于直面矛盾的担当精神。我国经济下行已经经历了九年。

对于这样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经济现象，作为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是直接面对还是视而不见，是论证其合理性还是寻求改变这一趋势的途径，天勇同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把近三年的主要精力用在研究这一问题上。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中外研究成果，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是一个自选课题，没有研究经费支持。仅此一点，充分表现出天勇同志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值得同行们称道和学习。

二是注重系统分析的科学态度。经济增速下降，只是一种表象，其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有内在原因，也有政策影响；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对此，各个经济学家由于其占有信息、知识结构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正确的结论只有在全面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才能得出。天勇同志对此问题的分析，是我所看到纳入分析的影响变量最多、采用数据最全的研究工作。他在研究如何实现经济增速翻转问题上，持以十分认真、严肃科学的态度，对此，也值得称道。

三是针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分析矛盾并不是研究的目的，研究问题的目的在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为矛盾向有利的方面转化提供智力支持。天勇同志这两本书不是罗列一大堆矛盾和原因就此了事，而是把重点放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这是难能可贵的。当前经济工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推动经济走势的翻转，即由增速下降趋势扭转为上升，而且不是短期上升，是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着眼于如何实现三步走战略，到 21 世纪中叶使中国在人均国民收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一个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能够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敢于向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起冲击，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值得所有的经济学者学习。如果中国的经济学

家和政策研究者都围绕解决这一主要问题想办法，就一定能找到理想的方案，并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提供选择。作者提出的提高人口素质、释放农村资源潜力、发挥城市群的带动作用、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等建议，我认为是切实可行的。

四是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作者认为，实现经济增长趋势由降转升的翻转，关键在于针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进行重大改革。作者对产权结构创新、人口生育政策、城乡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教育体制、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这些建议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要素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打破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之间的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地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通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释放巨大发展潜力，使之成为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强大新动能。

五是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形势下，尽管我们面临着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已经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并具备全球第一出口能力，我们在国际市场回旋的余地更大了，回旋能力更强了，只要机动灵活、妥善应对，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和建议，是天勇同志的长项，写得很精彩，我都赞同和欣赏。

作为一个涉及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尚需深化，以使对策更具针对性、有效性。

对城乡一体化问题应提到更高的程度来认识。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的新二元结构，是当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 $1/3$ ，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大到 $1:2.7$ 。这既是主要矛盾所在，也是主要潜力所在。围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推进各项改革，才能抓住主要矛盾，促成经济走势的翻转。对此，希望天勇同志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再多下点功夫。

解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问题，除了要减税清费，精简政府机构，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还需要进行税收结构的调整，即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过渡到直接税为主，扩大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降低企业税收比重。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比重达 70% 左右，因此企业税负较低。我国把企业作为主要纳税对象，有其历史原因，一是由于过去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二是企业财务部门代扣税，征税成本较低。随着企业的国际化，原有的税收结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需要，也不适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要求，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势在必行。同样，解决企业债务率过高问题，需要改变企业融资结构，把现行以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融资为主，为此需要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

改革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但在 20 年之内，主要还是应把现有 13 多亿人口的潜力发挥出来。美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的 6 倍，如能缩小到 3 倍，我国 GDP 总量就能远远超过美国。发挥人力资源潜力，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天勇同志的这两部新作，非常值得从事经济工作的各个政府部门政策制定及执行者们，从事经济研究、教学工作的学者们，从事投资、创业、产业、金融、贸易、外经、咨询等方面的从业者和企业家们，也包括关心中国经济命运和发展前景的国内外人士们认真一读，一定大有裨益。

我相信，天勇同志这两部姊妹篇著作中所研究和揭示的一些人口与经济关系新的范畴和规律，会逐步地被学术、政策研究界和广

大读者们认同。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 56 个民族，是经历了许多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在经济、人口、环境、资源、战略、政策等各学界、各智库、各政府部门和广大民众理解以往难处、卸掉历史包袱和同心同德向前看的胸怀和共识下，研究对策，深化改革，万众一心，释放活力，艰苦奋斗，寻求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中远期健康和中高速增长，我们必定会在地球欧亚板块的东部，建成一个人民富裕幸福、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安宁祥和、民族繁盛强大的国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

2017 年 2 月 10 日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开始下行，到2016年已经长达9年。增长速度为8%以下的2012年到2014年，学界、企业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包括国际人士，大多对未来还较为乐观，以为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的，增长还会恢复到8%以上的高速状态。进入2015年和2016年，国内各界，甚至国际上，学界、政界和企业界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下行的严峻性和可能的更加长期性。

一、究竟应当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1年，中国的GDP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了33年。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机理解释，推进了以中国为案例的经济学分析的进展。然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点一直下行的内在机理的各种经济学解释，都不能令人特别信服。笔者主持撰写的《繁荣的轮回》一书中，给出了本次经济下行内在和深层次原因的解釋，从人口生育、增长、结构和流动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20年滞后影响规律等方面，对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规模最大国家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做了经济学逻辑性的诠释。

除了最基础的人口收缩、老化因素外，一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时期的下行往往伴随着多种变量的作用。在这本《跨越发展的陷阱》书稿中，笔者描述了政府税收及行政收费、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负担过重，融资、运输、能源等成本过高，以及 2013 年以来国民经济内外资金、投资、消费等从净流入到净流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

经济学有点像医学。人们需要利用经济学的知识和工具，去找出国民经济静态状况和动态过程中结构失衡、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失业增加、增长低迷等各种各样困扰社会健康发展的问题，特别是根据不同的国家和情况，搞清楚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及其组合，也就是想出很多方案，评价各种方案的风险、时间消耗、代价和效果，提供给决策者权衡和选择，然后制定政策和执行落实，反馈观察，最终要解决问题。

当然，运用经济学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并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学习的样板，提高成功国的威望，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领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学者而言，发现研究问题在哪儿和是什么，其成因是什么，有多少解决问题的方案，每个方案有什么利弊和风险，如何克服阻力及对冲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等，是更为重要的责任和工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更需要的是这样的经济研究。

研究一国的经济问题，需要了解国情、实事求是，用数据说话，观察流程，纵向回顾、横向比较。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较低，未达到 75% 的水平，城市化的推动力还可以使未来中国经济保持 8% 以上的高增长速度 15 年到 20 年。然而，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实行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

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实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而对这一点视而不见，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中国的土地、户籍、教育、住宅、医疗、养老等体制与其他国家也是不一样的，相当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青出老回”，而且相当多农村老年人是过去可以城市化而被体制所阻变老，这部分巨额人口中很多也不可能再城市化，而是会终老于农村。因此，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不观察人口的实际流动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行简单的类比，而不进行国与国之间重要方面的差异性比较，结论肯定是错误的。

前面已述及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搞清楚和了解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怎么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呢？因而，经济研究首先要允许讨论问题，有的可能还较“热”，如财政收入和税负率、计划生育、土地体制、产权结构、资金外流等，要分析它们对企业投资和经营的影响，分析人口变动的经济后果，分析与土地有关的投入和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分析产权与投资积极性、资金流动、汇率稳定基础等的相关性，这样才能搞清问题发生的机理和在此基础上开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其次，要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经济研究，真正找出问题及其发生的机理，拿出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许多不同观点争论、综合的结果。毕竟一派学者的看法和建议总是会有想不周全，甚至是没想对的情况。单听少数人的意见，不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往往会错误拍板和决策。比如说，只听一面之词，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变化，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了，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会更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只是由于经济治理不力，以此来决策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显然是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客观的经济研究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进步，也要顾及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利益。我们要做这样的政策研究既

要讨论产权、分配的保护和规则，对技术创新、再投资的激励，使社会更多地创造财富，使国家成为有竞争力的强国，又要考虑如何通过教育体制培养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鼓励创新创业和发展中小企业，形成使低收入人群向上流动的机制，用积极的方式推进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大体公平化，还要设计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制，通过再分配的办法促进社会消费和共同富裕。研究不能极端化，不能因研究者本人的立场或迎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反对合理的公共收入；也不能只站在一方立场上，而不提出税费负担太重、供养规模没有控制住、土地财政扭曲、制造业成本太高等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治理能正常运转、执政成本节约、财政收入开支受人民监督的阳光和现代的财政税收体制。当然，这需要触及利益，因而需要壮士断腕的改革。

二、经济增速下行危险与翻转为上行的有利条件

笔者认为，由于人口增长曲线前 20 年向下急转弯，后来的斜下以及再后来的 5% 左右和以下的低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下行的压力很大，其后长期在 1.5%~2% 的速度徘徊的可能性极大。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加上降低企业成本改革的艰难性和对外经济开放的复杂性，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各种极端问题的风险在加大。重点有：人口增长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产生下拽力；改革支撑起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变动、企业成本、对外漏损等造成的经济下行速度；由于经济下行，亏损和破产企业增多，形成大量的呆坏账，与银行等体系的借贷等关系恶化，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由于供养规模没有得到控制，经济下行时税费等政府收入减少，国家结构中上层建筑的需求与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之间发生严重的危机；经济下行时，收入减少，失业增加，房贷等压力加大，贫富分化，怨气积累，社会有可能民

粹化和极端化，动荡的危险性加大；而随着人口收缩和少子化、老龄化加剧，未来越来越大的养老金需求和资金收支的缺口将危及财政和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人口老龄化产品中养老成本太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在未来中、美、印人口和经济的竞争中，我们也处于不利境地。

除了前述过低速度增长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危险外，我国人均 GDP 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低迷，也会使人民收入的增加放慢，使政府提供幼托、教育、廉居、医疗等各方面公共和准公共服务的能力枯竭，而且我们还需要积累雄厚的财富去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养老保障问题。经济低速发展，就没有财富向这些方面分配和倾斜的源泉，所以不能放任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过度地下行。

作为引领欧亚大陆东部文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会因为 20 世纪后 30 年及 21 世纪上半叶的人口变动及其惯性的后果而逐步衰落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是世界大家庭中睿智的民族之一，富有勤俭储备、创业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庞大的技能劳动者队伍，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积累了大量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今非昔比，领先技术占到了全球的 19% 左右，研发投入超过了 GDP 的 2%，正在向创新型国家迈进；城市、交通通信、工业、能源等基础和体系已经基本现代化，装备制造和配套以及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等设施甚至优于一些发达国家；一个人口近 14 亿规模的大国，本身就具有人口密集而形成的网络经济、分工协作的经济性、产业门类齐全、新技术容易产业化、消费和投资市场规模较大等多方面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对外经济中，中国的资金供给、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等也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虽然前面的路途坎坷艰难，但这是我们扭转经济颓势、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及信心所在。何况，世界各大国及地区各有自

己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三、如何将经济增速下行扭转为上行：对一些观点的盘点

学界对于如何支撑和重启新一轮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各有各的看法，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主要的主张和建议。

自然淡定和人口变动有益论。2013 年前后的两三年中，学界曾以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是一次自然的波动，增长速度会自然恢复，甚至一些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关系派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给目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协调发展的基础，是促进未来经济健康增长的因素。面对现在问题的严峻性，大多数学者似乎已经放弃经济会自然恢复到过去高速增长的看法了。人口变动有益论则会将人们的看法引导到经济增长下行是因为理政能力不足所致的误区上。

外因和强刺激论。这一观点认为，这次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国际经济波动的外因所致。中国经济本身因城市化水平较低而存在发展潜力，还会以 8% 以上的高速度增长 15~20 年，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同 1998 年一样，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上来。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11 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基础是 1978—1987 年中国最后一波人口高自然增长率延后 20 年产生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欧美资金进入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相结合的高增长。1998 年的财政政策只是起了辅助的作用。而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20 年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下行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的困难在于：你可以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印出货币来，但是在财政政策项目上得工资的劳动力在减少，用货币消费的人口在相对萎缩，这不是经济自然波动而形成的间歇性总需求收缩，而是一种国民经济器质性的总需求萎缩。前者可以以扩

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调整，而后者则无法借此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实际上，中国 2009 年实行强刺激经济政策撑起 2009—2011 年的速度后，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下滑到现在。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也实施了宽松刺激的经济政策，但日本的经济增长仍然低迷。实践证明，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有时很难以短期扩张的经济政策改观。当然，我不是说未来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技术创新论。许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将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动能。对此，我也十分认同。但是，想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拉起来，目前看来需要一批成熟的颠覆性技术，并可以大规模进入产业领域，能大规模化投入生产，供给消费和生产使用。从我国在世界先进领域中所占的位势、颠覆性技术群的储备等方面看，可能还达不到可以推动一次产业革命的能量。通过积累，借助颠覆性技术群在中国形成爆发式的产业革命，我认为最早也要到 2025 年左右。

创业支撑论。当然，没有大众创业，速度可能下滑得更严重，失业将更严重。但是，把它作为推动新一轮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力量仍然不够。

此外，学者们也提出各个方面的改革，期望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项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不可能有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力度。有的学者认为，新的经济开放能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中高速增长。然而，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资金、技术、产业等净流入和货物出口高速增长国，变成了资金、技术、产业净流出，货物出口负增长和服务贸易逆差国。如果没有正常国民收入的回流，如果不能有效地带动国内关联产业，对外投资不可能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如同过去一样的推动力。一些学者也认为，要放开生育限制，增加新生人口，扩大消费，推动国民

经济增长。但是，新生人口对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产生推动力，在于其 20 年以后成为劳动力供给者、创新创业主力、住房和汽车购买群体等，因此，新生人口增长在短期内无法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因此，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需要找出国民经济增长被抑制动能的部分、最大内生动力源部分、需要盘活和开拓的动能部分，对症下药地进行改革，并且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尽可能地获得动能，减少动能的流出漏损。

四、如何将经济增速下行翻转为上行：笔者开出的方子

那么，怎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中高速增长呢？这本书思考和编制了一个系统的方案，这里做一些说明和解释。

其一，什么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是实体经济的高成本。必须采取大力度的措施，减税清费、下调社保费率、改革和废除土地财政，降低融资、能源、交通、土地等企业成本。如果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太大，绕过它们而以其他办法寻求恢复制造业的动能，根本不可能实现恢复国民经济体力的目的。借用中医上的说法，就是国民经济要减轻负担、休养生息。

其二，从 1978 年以来三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经验来看，需要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基础上广泛而又深入地启动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实际上，我们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迈进，主要是在产权结构方面，这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这既是我们今天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活力不足、资源闲置等许多问题的症结，也给我们形成爆发式动能、推动新一轮经济中高速增长留下了宝贵的余地。通过比较各种办法，笔者认为，最有可操作性、风险最低、成本最小、改革阻力最低、大多数人都受益、公众最拥护、获得增长动能最大的改革，就是知识产权改革，以及在国有和集体

所有制不变格局下，明确土地等不动产自然人和法人使用财产权、宣布永久使用、废除行政垄断交易等大力度的改革。舍此再找不出其他更有力量的能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的办法。

其三，创业、创新和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为近期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支撑，还将为先后推起 2025 年和 2036 年第二轮及第三轮两次国民经济上行 J 型增长做动能储备。目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生育限制放开等改革，均是国民经济增速不至于下滑太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体制上看，2025 年，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要基本定型，其后再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求国民经济增长爆发式动力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创新和生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是可能在 2025 年左右形成颠覆性技术群，实现中国 21 世纪的产业革命，在本次改革动能再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一个阶段；二是可以通过 2017 年全面放开人口限制，鼓励生育，适当移民，使人口增长速度上行，在 2036 年后使经济主力人口增长速度上行，在产业革命动能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作为爆发式新动能第三次拉起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笔者认为，通过这种中远期增长动能的布局，我们在与人口经济大国美国和印度等的竞争中将会立于不败之地，从而确保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

其四，需要盘活现有国民经济中活力不足、低效率利用甚至闲置的要素和资源。主要是通过土地与登记地产权体制的改革，促进城乡之间的耕地、林地、宅基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通过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激发员工动力，提高资产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其竞争力；通过有关创新体制的改革，盘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研发中心的人才、技术、项目、平台等要素和资源，调动研发人员的创造力。亦即通过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激发活力，使投入产出尽可能最大化，形成国民经济增长新的动能。